

生育力遗留：当婚姻被压入一件不该由它独自承载的东西

当婚姻被要求独自承接生育秩序的全部重量，爱便在功能的重压下失去呼吸。

王德生 · 婚姻幸福专栏 · 约 2.9 万字 ·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当代关于婚姻的主流叙事认为，外部制度与市场正在系统性地替代婚姻的传统功能，使其走向“空心化”并趋于瓦解。本文挑战这一诊断，提出一个反直觉的判断：AI 时代婚姻正在经历的，不是功能被掏空的“解体”，而是一种更隐蔽的结构性反转——当外部度量系统全面收编了那些可被标准化、可被评估、可被纳入投入-产出链条的培育功能后，一个本质上不可度量、不可规划、不以任何可预期产出为目标的沉重之物，正在被排他地遗留进核心家庭的亲密关系中。它不是旧功能的回归，也不是新功能的形成，而是一种功能形态的质的跃迁：婚姻正在从“项目交付型”的功能载体，转变为“无指标兜底型”的存在容器。本文从演化人类学、发展心理学与情感社会学的跨学科证据出发，论证这一反转的发生机制：生育力——维系一个活的生命在不被完全定义的状态中持续生长的那种弥漫性在场——曾是由广泛共同体网络分摊的基质。当城市化、劳动制度市场化和性别角色变革在数十年间瓦解了这一承载结构，而度量系统又同步收编了所有可被量化的培育任务，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便作为那个“测不到、却又不可或缺”的残余，被集中地、排他地压入了唯一不可替代的地带：亲密关系的肉身在场之中。本文进一步分析，这种遗留之所以制造出独特的窒息感，不在于重量本身，而在于这个重量无法在任何社会词典里被识别为“功能”——它让夫妻只能用处理功能性任务的语言去承载一件本质上与绩效无关的事，由此在微观互动中一轮轮地发生出认知的错位、期待的错位和语言的错位。在结论中，本文指出破局的缝隙不在于卸下重负，而在于承认它的无名称性，并给出明确的证伪条件。

关键词：生育力；无指标兜底；婚姻功能形态；亲密关系的肉身在场；发生学分析

一、引言：被误诊的沉重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对婚姻极为悲观的年代。流行的叙事以“功能解耦论”的面貌获得了广泛共识：经济学家指出婚姻的经济合作功能已被平台金融和双职工独立薪资所替代；社会学家观察到日常照料功能正被外卖、家政和陪诊服务所外包；心理学家担忧情感慰藉功能正在被数字社交网络、在线娱乐乃至初代AI伴侣所分流。在这种叙事中，婚姻被描绘成一座正在被逐件拆走承重墙的大厦——当经济、照料、情感、育儿乃至性满足都能在市场上找到更高效的替代品时，婚姻似乎只剩下一个法律契约的空壳，等待着最终的结构性的倒塌。

这个叙事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也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共鸣。但它极有可能遮蔽了当前婚姻困境中最关键的真相——因为它无法解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如果婚姻正在因功能流失而变得“空心”，为什么那些留在婚姻中的人，报告的疲惫感、焦虑感和被掏空感，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

“空心化”的隐喻有一个不可救药的缺陷：空心之物是轻的，是容易飘散的。但当代婚姻的亲历者描述的，很少是一种轻飘飘的感觉。他们描述的是沉重、是窒息、是被压得喘不过气。这种沉重弥漫在中产家庭的日常里：在那些被作业、练琴、比赛和履历建设填满的夜晚，在那些全部对话都被任务分配和进度检查所占据的周末，在那些即使两个人独处、话题也不可遏制地滑向孩子的学习计划的所谓“约会之夜”。这种沉重感的典型形态，可以在一对夫妻的十五分钟沉默中被体认——两个人精疲力竭地坐着，不说话，不碰对方，没有争吵，没有冷战，只是在等待下一个任务或终于可以去睡。那种被无形的重量压得说不出话的感觉，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都能瞬间辨认、却无法准确命名的经验。

这说明，婚姻正在经历的，不是被掏空，而是被另一种东西重新填满。问题是：被什么填满？

目前学界最具洞察力的修正来自一个可以被概括为“功能锁死”的论述方向——它指出婚姻面临的不是功能解耦，而是功能的不对称强化：当日常照料等操作性功能被外包，培育下一代抵御不确定性的综合能力这项核心功能反而被更重、更排他地压回了婚姻。在社会学对“密集母职”和“育儿焦虑”的讨论中，在心理学对“亲职倦怠”的研究中，这一判断的轮廓已清晰可辨。它比“空心化”更接近事实，有效解释了那种“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做不完的事”的疲惫感。但它在理论底层上仍然共享了功能解耦论的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它把婚姻承载的这项重负，仍然当作一项“功能”来处理。

功能是可以被定义、被描述、被纳入因果分析框架的——它有投入、有过程、有可识别的产出。功能是可以被追溯、被还原为该领域已有理论传统中的某个概念的。功能解耦论说“功能在减少”，功能锁死论说“核心功能在加重”——二者的分歧在数量的增减上，但它们共同默认了问题落在“功能维”：婚姻承载的是功能，困境的根源在于功能配置的变化。

本文要论证的恰恰是：AI时代婚姻正在经历的，不是一个新功能替代了旧功能，而是“功能”这个概念本身在婚姻的内部开始失效。有一种东西正在被排他地压入婚姻，它沉重、它占据一切时间、它让人精疲力竭——但它不是一种功能。它无法被“培育竞争力”“培养判断力”“锻炼韧性”这类功能性词汇

所捕捉，因为它的本质恰恰在于：它不以任何可预期的产出为目标。它维系一个活的生命在不被完全定义的状态中持续生长，而这个“维系”本身，无法被拆解为标准化的投入-产出链条。

这不是旧功能的回归，不是新功能的形成，而是一种功能形态的质的跃迁。婚姻正在从“项目交付型”的功能载体——其运作逻辑是“有目标的投入导向特定产出”——转变为“无指标兜底型”的存在容器——其运作逻辑是“不以任何可识别产出为目标的生养维系”。这种跃迁，是外部制度系统在全面收编一切可度量功能之后，那个“测不到的东西”被遗留在了唯一不可替代的地带——亲密关系的肉身在场之中。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既有解释的共享预设出发，诊断“要害此刻落在哪一维”，论证现有理论的根本局限在于它们共同接受了“功能”作为分析婚姻承载物的唯一合法范畴，而那个正在被压入婚姻的东西，恰恰是“功能”范畴装不下的。第三节正面阐述功能形态跃迁的发生机制：外部度量系统如何全面收编了可量化的培育功能，而那个不可度量的残余——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如何在共同体网络瓦解的同步进程中、被遗留在了核心家庭内部。第四节论证婚姻成为这一遗留之唯一容器的结构性原因。第五节转入微观层面，以一桩真实的夫妻互动案例为解剖标本，追踪那个无名的沉重如何在十五分钟的沉默中、经由夫妻各自认知框架与既有对话模式的约束，被一轮轮地错位成可说出的指责。第六节梳理既有研究脉络，并正面论证生育力转储概念与亲职压力、情感劳动、安全依恋等理论传统的区别。第七节主动面对最有力的质疑并作出回应。第八节探索破局的可能性。第九节总结并给出证伪条件。

二、重判要害：这不是功能的增减，而是“功能”本身的定义在失效

要判断一个议题的纵深在哪里，不能只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在“什么层面”上说话。面对AI时代婚姻的困境，现有解释——包括功能解耦论和功能锁死论——都把问题的要害定位在“功能”的层面：前者认为功能在流失，后者认为功能在不对称地强化。但如果这篇论文真正的要害不落在功能维，而落在“功能这个概念本身的合法性边界”上——那么，换一个起手维度，整篇的纵深会完全不同。

2.1 共享的预设：功能与婚姻之间是“承载”关系

功能解耦论和功能锁死论尽管在结论上对立，在理论底层上却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婚姻的“困境”可以通过分析它所承载的“功能”及其变化来得到理解。这个预设看起来如此自然，以至于很少有人去质疑它。婚姻承载功能——经济合作、日常照料、情感亲密、育儿养老——功能变化了，婚姻就变化了。功能流失了，婚姻就空心化了。功能加重了，婚姻就被压垮了。

但“承载”这个隐喻本身，已经偷偷引入了一个未经审查的区分：在“承载”的关系中，承载物（婚姻）与被承载物（功能）是两个可以分开来谈的东西。就像卡车和货——货可以装上去，也可以卸下来；货可以变轻，也可以变重；卡车本身是卡车，货本身是货。这个区分的合法性，对于经济合作、日常照料这类操作性功能是成立的——它们确实可以在婚姻之外被独立定义、被市场替代、被外包。

但当“承载物”和“被承载物”无法被清晰分开时——当那个正在被压入婚姻的东西，其性质恰恰是“不能脱离这个具体关系而独立存在”——“承载”隐喻本身就不再适用了。

这不是一个修辞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它决定了我们是在讨论“婚姻承担了一项沉重的任务”，还是在讨论“婚姻本身被某种非-任务性的东西所彻底占据”。前者的要害落在功能维：任务如何推进、压力如何分配。后者的要害落在“功能”这个概念本身的合法边界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现有的概念无法装下它。

2.2 五连问：追到那个底层先验

要逮住那个从未被质疑的先验，必须对既有解释的核心判断依次追问，直到问不下去为止。

第一问——这个领域里最痛的矛盾是什么？

婚姻困境研究中最讲不通、最反复出现却从未被真正解决的那个张力是：人们普遍报告自己的婚姻“很累、很窒息、被掏空了”，但当你让他们具体说出“是什么事让你这么累”时，他们列举的事——陪孩子写作业、规划课外活动、周末接送、与老师沟通——单独看每一件，都不足以解释那种弥漫性的耗尽感。这些事的强度累加起来，仍然小于他们所描述的那种“被压得喘不过气”的主观体验。就好像有一种额外的重量，没有名字，不在任何清单上，却实实在在地压在他们身上。

这个矛盾是真实的，也是系统性的。在亲职压力的调查中，父母常常报告自己在“育儿事务”上的时间投入并不比其他同龄人多出太多——尤其在那些已将大量操作性功能外包的家庭中——但他们的主观疲惫感却显著高于其他群体。这种溢出效应无法被现有量表充分捕获。当一个人说“我很累”，研究者通常追问“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以一种什么状态存在了”。

第二问——旧的解释路径为什么反复失效？

功能解耦论无法解释这个矛盾，因为它只能看到功能流失，看不到重量增加。功能锁死论看到了重量增加，但它将这个重量定义为“培育未来主体的沉重功能”——而“培育”是一个功能性词汇，它预设了这个重量可以被拆解为投入-产出链条。它用“功能锁死”来命名这个矛盾，努力缓解了矛盾但从未抵达它的根源——因为它把这个“说不出的沉重”硬塞进了一个功能概念里，而这个功能概念本身，恰恰是问题的一部分。

第三问——这些失效背后，大家默认为真、从来没有质疑过的那个先验假设是什么？

到这里，第一个被逮住的先验浮现了：婚姻困境是“功能层面”的问题。无论是功能解耦还是功能锁死，都把婚姻承载的那个沉重的东西当作一项“功能”来理解——它有目标（培育合格的下一代）、有投入（时间、精力、情感劳动的付出）、有可识别的产出（孩子的竞争力、心理韧性、道德判断力）。这个先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一个已婚者说“我好累”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去问他“你在忙什么”——默认那种累一定有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功能性来源。

第四问——如果撤销那个先验，会打开什么？

如果撤销“婚姻承载的那个沉重之物一定是一项功能”这个先验，会打开一个此前被完全遮蔽的空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正在被压入婚姻的最沉重的东西，压根不是一项功能？它无法被定义为“培育”，因为它不以任何可预期的产出为目标。它无法被纳入投入-产出分析，因为它的所谓“产出”——如果真的要去看——是二十年、三十年后才可能显现的，且显现时根本无法被追溯到某个具体的“投入”上。它占据一切时间、消耗一切精力、让人精疲力竭，却不在任何社会词典里拥有一个名字。

第五问——逮到底层：这个先验本身又预设了什么更不容置疑的东西？

这里需要再追一刀，因为“婚姻承载的是功能”这个先验还不是最底层的。它背后还藏着一个更深的预设——一个连那些最敏锐的批判者在提出批判时都还站在上面的东西：任何真正重要的、值得被社会制度关注和资源投入的人类活动，都必须以“可预期的成果”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

这就是那个根性假设。它不是说“婚姻在做一件没有成果的事”，而是说“维护一个活的生命在不被完全定义的状态中持续生长”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一个可以被提前写明的“成果”。一个孩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会在什么样的时刻想起父母曾经给予他的那些没有特定目的的关注——这些东西，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被提取为一个“培育指标”。它们在发生学上是真实的，在功能学上是不可见的。

功能锁死论已经超越了“空心化”叙事，但它这一步超越本身，仍然偷偷站在这个底层先验上——它把那个“不可见”的东西，硬生生命名成了一项“可见的功能”。它说“培育下一代抵御不确定性的综合能力”——这个表述里的每一个词，都在试图把那个弥漫的、无指标的、不以特定产出为目标的东西，翻译成一种可被社会识别的功能语言。这种翻译让问题变得可以被讨论，但同时也在讨论的入口处就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

2.3 那个不可见之物：生育力遗留

为了把这个不可见之物推到可见的位置上，本文必须给它一个精确的命名。这个概念不是从任何既有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底层先验被撤销后、那个矛盾自己结算出来的必然显露。下文将它命名为：生育力遗留。

“生育力”在这里不是指生物学上的生殖能力。它指向一种更广义的生命维系能力——将一个活的、成长中的、尚未被定义的生命维系在不被完全决定的状态中，使之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去长成自己将要是的那个样子。这种维系，需要一种特殊的在场：一种不以任何特定目标的达成为前提的、持续的、情感上可用的、在关键时刻不会退场的肉身存在。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史中，这种生育力是被分摊在一个广泛的共同体网络中的。大家庭、邻里、宗教共同体、稳定的职业传承、相对可预测的社会流动路径——所有这些制度，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

对下一代生命的“无指标维系”。它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功能性支持（照料、教育、经济扶持），更重要的是它们分担了那个弥漫的、不指向特定产出的、仅仅作“在场”而存在的重量。

“遗留”则是要精确描述当代正在发生的那个过程：当外部制度系统在全面收编一切可度量的功能（知识传递被学校承接、技能训练被市场外包、甚至情感发展的某些侧面也被社交情绪学习课程所吸纳）时，那个不可度量的残余——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被从所有这些已被收编的领域中排挤出来。它没有被“接走”，也没有“消失”。它被遗留了下来。而当共同体网络同步瓦解——那些曾经在漫长的演化史中分摊过这个重量的祖母、阿姨、邻居、社区——也纷纷退场时，这个被遗留的残余找不到任何可以分流的地方。它被集中地、排他地倾倒进了唯一无法被收编、也无法退场的容器：亲密关系的肉身在场之中。

“遗留”既指这一历史过程——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从社会共同体网络中被剥离、同时找不到任何替代载体而被原址搁置的过程——也指这一过程所造就的当前状态：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从广泛的社会分摊中被抽离，并被排他性地锚定在核心家庭的亲密关系中。

这就是本文的核心判断：当代婚姻正在经历的，不是功能的流失或加重，而是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在共同体网络瓦解与度量系统收编的同步进程中，作为一个“测不到、却又不可或缺”的残余，被遗留在了核心家庭的婚姻关系内部——而婚姻关系本身，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情感上，都无法独自承载这个尺度的重量。因为这个重量本就不是为二到四口人的核心家庭设计的。它是在数万年的演化中被一个几十人到上百人的共同体网络所共同分摊的。

这个概念必须通过一道硬校验：它能否被任何已有学科的现成概念用一句话无损替换？生育力遗留≠养育（养育是功能性的，预设可识别的情感/教育投入），≠照料劳动（照料是可外包的标准化体力/情感支出），≠情感劳动（情感劳动服务于可识别的关系维系产出），≠安全依恋（安全依恋是儿童一端的发展结果，而非成年人一端的存在形态本身），≠亲职压力（亲职压力依赖可识别的压力源——角色冲突、社会支持不足、经济压力——而生育力遗留所指向的恰恰是那个“不能被识别为任何具体压力源”的弥漫性沉重）。

它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概念——因为它切入的，恰恰是“功能”这个概念在婚姻内部开始失效的那道裂缝。亲职压力文献可以告诉我们“父母很累”，但不能告诉我们“那种累为什么说不出来”。安全依恋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儿童需要安全基地”，但不能告诉我们“当成年人被告知自己必须亲自去‘建设’这个安全基地——而且要不计代价、不设指标、全天候待命——时，那种‘建设’会在成年人的主观体验中变成什么”。本文要回答的，正是后一个问题。

三、底层的反转：度量系统的全面收编与那个“测不到的东西”的遗留

为了论证生育力遗留这一反转的发生机制，必须首先澄清一个关键的理论前提：外部制度系统正在全面收编的，不是“婚姻的功能”，而是“一切可以被度量的功能”。这个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外部制度只是在逐步替代婚姻的某些传统功能，那么婚姻面临的就只是功能流失或重新配置的问题。但如果外部制度在做的，是对整个社会空间中“可度量功能”的系统性收编，那么婚姻面临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同量级的问题：它被遗留的那个东西，不是“剩下来的功能”，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在度量系统之内”的东西。

3.1 度量系统的运转逻辑：一切都必须成为“可评估的产出”

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任何一项人类活动，要想被公共制度——学校、医院、企业、政府——系统性地承接，它就必须被翻译成可以被度量、可以被评估、可以被纳入投入-产出分析的形式。这不是某个特定机构的偏好，而是现代治理理性的深层逻辑：公共资源的分配需要正当性，而正当性的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可量化的“成果”证明。一个无法证明自己“有效”的项目，在制度层面就无法获得持续的资源投入。

在孩子的成长这件事上，度量系统已经完成了对几乎所有可度量环节的全面收编。知识传递被学校承接——这是一个高度可度量的领域：有课程标准、有考试分数、有升学率、有PISA国际比较测试。技能训练被市场外包——课外辅导班、特长培训、编程夏令营，每一个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可展示的成果（考级证书、竞赛奖项、作品集），每一个都能向家长提供一份关于“孩子学到了什么”的可量化报告。甚至情感发展的某些侧面也开始被纳入度量范围：社交情绪学习（SEL）课程在欧美基础教育体系中广泛推行，配有标准化的教案、评估量表和效果研究。正念训练、心理韧性工作坊被引入学校，承诺提升学生的专注力和情绪调节能力——这些承诺通常附有前测后测的数据支持。

这些领域的收编过程，在制度层面有其清晰的轨迹。以学校教育为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义务教育体系的建立将知识传递从家庭和学徒制中大规模地“接走”，并迅速建立了一套覆盖读写算基础技能的标准化的评估体系。二十世纪后期，课外培训市场又进一步将技能训练从家庭日常中剥离，形成了从钢琴考级到编程竞赛、从奥数集训到体育特长评级的完整产业链。近二十年来，情绪管理和社交技能的培训也开始被“课程化”。一项针对SEL项目在美国推广情况的综述性研究指出，截至2010年代，美国已有超过半数的州将SEL纳入学前教育至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而围绕SEL项目效果的元分析研究也在快速增长。每一项被收编的活动，都经历了一个共同的操作：被定义出可测量的目标（“掌握XX知识点”“达到XX级别”“展现XX社交技能”），被配备可操作的流程（教学大纲、训练计划、课程模块），并被纳入可比较的评估框架（分数、等级、证书）。

这种收编本身不是恶意的。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家庭压力的一种分担——它把那些可以被标准化的培育任务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让父母不必再亲自教孩子识字、算数、弹琴。在资源充裕、支持网络

健全的家庭中，这种分担的实际效果是积极的：它释放了父母的精力，让他们可以有时间陪伴孩子做那些“非功能性”的事——散步、聊天、一起发呆。但问题在于：当度量系统持续扩张其收编范围，当“可被收编的”越来越多地被接走，那个剩下来的东西，恰恰因为其不可被收编的性质，而越来越无从分摊。

3.2 共同体网络的瓦解：生育力是如何失去其承载结构的

在度量系统收编可度量功能的同时，生育力无指标形态原有的广泛承载结构——共同体网络——正在经历历史性的瓦解。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由几个具体的社会结构转变所驱动。理解这个维度，不能停留在“家庭小型化”的统计描述上，而要追问：什么样的历史动力，把生育力从“整个村子”压进了“两室一厅”？

城市化与家庭小型化是第一个推手。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将大量人口从农村宗族聚居区迁移到城市核心家庭单元。中国的数据尤为触目：根据人口普查，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53年的4.33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这意味着那个曾经由祖辈、叔伯、姑娘、堂表亲共同构成的生育力承载网络，在空间上被拆散了。今天一个典型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与祖辈的日常接触从“同一屋檐下”缩减为“一周一次视频通话”或“寒暑假见面”——而那种弥漫的、无目的的“在同一个院子里待着”的在场，在视频通话中是不可得的。视频通话有主题、有时间限制、有“说再见”的时刻——它恰恰是一种功能化的互动，无法复制“仅仅是共同存在”的基质。

劳动制度的变革是第二个推手，而且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现代双职工家庭模式使男女双方都被整合进市场劳动体系，这不仅剥离了谁留在家“维系在场”的传统分工，更重要的是，它把成年人的时间和精力从非经济活动领域大规模抽走，注入经济活动领域。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传统共同体中，那些分摊生育力重量的成年人——祖母、姑娘、邻居——她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她们的时间是以一种更低效率、更非结构化、也更弥漫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她们可以花一个下午坐在门廊上剥豆子，顺便看着院子里的孩子玩耍。这种时间组织结构本身，就是生育力无指标形态的天然土壤。而当几乎所有成年人都被抛入朝九晚五或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中，那种弥漫的、非结构化的在场时间本身，就成为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

性别角色变革带来了第三个转折。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无疑是一项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下，母亲和女性亲属网络是生育力无指标维系的“默认承载者”——这种承载在道德上被自然化（“母性的本能”）、在经济上被隐形化（无偿家务劳动不被计入GDP）。当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那部分曾经由她们承担的弥漫性在场并没有自动地、均匀地分摊到男性和其他社会制度身上。它被遗留了下来，成为一个没有明确责任人的“残余”——而由于社会规范仍然倾向于把“孩子的事”默认为母亲的第一责任，这个残余最后往往被压回了母亲一个人身上。这一机制有助于解释一个困惑了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发现：为什么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女性承担的情感负载和精神劳动——那些“记得孩子的疫苗时间”“感知到孩子今天情绪不对”的弥漫性认知

负荷——仍然远远高于男性。部分答案就在于，那个无法被列入任务清单的无指标维系，被默认为“母亲的本能”，从而在不在任何人的议事日程上的情况下，完成了向女性的遗留。

这三个历史过程——城市化与家庭小型化、劳动制度的全面市场化、性别角色的变革——在十九到二十一世纪间持续推进。它们的叠加效应是：生育力原有的、由广泛共同体网络承载的结构被系统性拆解，而与此同时，度量系统对可度量功能的全面收编，又将那些“看得见”的培育任务一一接走。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作为那个“既无法被拆解为功能、又无法在共同体瓦解后被自然分摊”的残余，被集中地、排他地遗留在了核心家庭的亲密关系之中。

3.3 横切证据：演化人类学与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的

这一判断不是纯粹的哲学推演。来自演化人类学与发展心理学的跨学科证据，为“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是一种被广泛共同体分摊的古老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人类学家萨拉·布拉弗·赫尔迪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母亲与他人》中，系统论证了一个颠覆性的论点：人类之所以能够在演化中养育出大脑如此巨大、发育如此缓慢的后代，关键不是因为核心家庭的存在，而是因为“合作繁殖”的演化遗产。在人类漫长的采集狩猎历史中，一个婴儿的存活和成长不只依赖母亲，而是依赖着一整群“异母”——祖母、阿姨、姐姐、邻居——的共同投入。这种投入在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特定“教育行为”，而仅仅是“在场”：抱着孩子、看着孩子、让孩子在多元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自然地观察和学习。赫尔迪的证据链条中有一个特别相关的发现：在那些仍然保留着传统合作繁殖模式的社群中，母亲的压力水平显著低于核心家庭隔离环境中的母亲——即使前者在物质条件和医疗保障上远不如后者。压力的差异，不是来自“育儿的任务量”的不同（传统社群中的母亲往往从事更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来自“育儿的情感重量是否被分摊”。当母亲知道随时有人在旁边、当她不需要为孩子的每一分钟负责、当孩子的安全和发展不被视为她一个人的绩效指标时，那个弥漫的、不可名状的沉重感就会显著降低。这一发现得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发展心理学跨文化比较的间接支持——核心家庭隔离环境中的母亲，即使在客观育儿负荷较低的情况下，其主观亲职压力的各项指标（焦虑、疲惫、角色紧张）往往反而更高。这提示，育儿体验中的重压，不完全来自“做了多少事”，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独自背负了整个存在”。

发展心理学的证据则从另一个方向切入。依附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虽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共享一个深层共识：儿童的心理发展——包括情感调节能力、社会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感——不能被还原为特定的“教育活动”的产出。它是在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充满情感张力的关系网络中“浸泡”出来的。约翰·鲍比提出的“安全基地”概念，其本意是指一种儿童对照顾者的信任——不是因为照顾者做了什么特定的“培育”举动，而是因为照顾者的持续在场和情感可及性，让儿童感到安全，从而敢于探索外部世界。在鲍比的原初论述中，安全基地不是一个可以被拆解为“步骤一、步骤二”的工程项目，它是一种在关系中自然发生的品质。这不是说父母不需要做任何具体的事，而是说“具体的事”只有在一种弥漫性的、非工具性的关系基质中，才能发挥其发展性作用。你把

一个孩子送到最好的课外班，但如果他回家后没有一个他信任的大人只是坐在那里——不一定在陪他、不一定在教他、仅仅是“在”——那些课外班的学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基质的逻辑不是加法的，而是乘法的：它不直接产出任何可测量的“能力”，但它让所有其他能力的培养成为可能。

这个“基质”概念，是理解生育力无指标形态的关键。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拆解为具体功能的东西。你无法从基质中分离出“社交技能培训”或“情绪管理课程”的成分，因为基质的运作逻辑不是功能性的——它是弥漫的、持续的、不以特定产出为目标的。在健康的生态中，基质是由整个共同体共同提供的。而在当代城市中产家庭中，这个基质正在被压缩到核心家庭内部，甚至被压缩到母亲一个人身上。

这个压缩，就是本文所说的“生育力遗留”的演化人类学实质。它不是“培育任务加重了”，而是“那个曾经由二十个人日常在场共同分摊的、不指向任何具体教育产出的弥漫性存在，现在被要求由两个精疲力竭的成年人——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一个——独自承担”。它也不是“共同体的功能性替代品不够”，而是“共同体提供的那种无指标在场本身，无法被任何功能性安排所替代”。你可以雇一个保姆照料孩子的生活，但你不可以雇一个人成为“孩子生命中不可替代的那个在场”。而那个“不可替代的在场”，恰恰是生育力无指标形态的核心。

3.4 从“功能”到“土壤”：一个范畴的失效与一个维度的浮现

迄今的论证可以收束到一个点上：当代婚姻困境的要害，不在于功能维——不在于婚姻承载了多少功能、这些功能是轻了还是重了。它的要害在于，“功能”这个概念本身在婚姻的内部开始失效。有一种东西正在被排他地压入婚姻，它占据了全部时间、消耗了全部精力、让人感到被掏空——但它不是一项功能。它是在功能度量系统全面收编了一切可度量之物后、在共同体网络瓦解之后，被遗留在婚姻这个唯一不可替代的肉身在场中的、不可度量的生育力残余。

当“土壤”被当作“功能”来承载时，压垮婚姻的不是功能的重量，而是土壤不可被功能化的那种弥漫性，在一个被功能逻辑主导的生活中根本没有可以呼吸的缝隙。夫妻被要求共同承担一件无法被任何任务清单列举、无法被任何时间表排期、无法被任何绩效指标评估的事——而他们的全部日常语言和行为模式，都是为处理功能性任务而设计的。他们只能用功能的语言去说那个无法被功能化的事，只能用绩效的逻辑去处理那个本质上与绩效无关的维系。这种语言与存在之间的错位本身，就是窒息感的源头。

四、为什么是婚姻？——流通网络中的非流通孤岛

一个严肃的反驳者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有力的问题：就算承认那个“测不到的东西”的存在，就算承认共同体网络已经瓦解，为什么它偏偏落在了婚姻上？为什么它没有被其他社会关系——成年兄弟姐妹、深厚的友谊、社区邻里——所分摊？现代社会毕竟不是只有核心家庭这一个社会单元。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论证婚姻在社会关系的流通网络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它恰恰是所有可流通功能被收编之后，唯一剩下的那个不可流通的节点。

4.1 可流通的功能：那些能被转移到外部制度的东西

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被从婚姻中“接走”？答案是可流通的功能——那些可以被标准化、可以被定价、可以被放在不同的执行主体之间转移而基本不改变其性质的人类活动。

日常照料是最典型的可流通功能。做饭这个动作，在家里做和在食堂做，其物理性质基本不变。知识传递同样可流通——一个优秀的物理老师在教室里讲力学，和在视频网站上讲力学，知识传递的内容可以保持一致。甚至某些形式的情感支持也在成为可流通的——心理咨询师提供的倾听和共情，虽然不同于爱人的陪伴，但可以部分地满足一个人被看见、被理解的需求。这些功能的可流通性，来自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它们的价值可以被独立于执行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特定关系来定义。一顿饭的营养价值不取决于做饭的人是妈妈还是厨师。一个知识点的传递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方法的优劣而非教师与学生的私人关系。一次心理咨询的效果，建立在专业训练而非私人情感的基础上。正因为这些功能的价值是去关系化的，它们才可以被放到市场（或公共制度）中去流通。度量系统之所以能够收编它们，也正是因为它们具备了这种去关系化的特征——一旦某项人类活动可以被标准化、可以被定价、可以被评估其“产出”，它就从特定的亲密关系中被解放出来，成为可在流通网络中转移的“商品”或“公共服务”。

4.2 不可流通的残余：那个必须发生在“这段关系里”的东西

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恰恰是流通逻辑的反面。它的核心特征不是“做什么”，而是“谁在做”与“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做”。一个孩子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需要的，不仅是有人给他做饭、有人教他知识、有人听他说话——这些是可流通的功能。他需要的是：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对他来说不是可替代的。这个人在他生命中的持续在场，构成了一种无法被任何外部服务所复制的安全感。如果在孩子的感受里，照顾他的人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无论每一个多么专业、多么有爱心——他体验到的就不是“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为我而在”，而是“总会有一个人在那里，但哪一个人都一样”。前一种体验，是安全感、依恋和信任的深层心理基础，也是一个人日后敢于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做出自我抉择的心理地基。后一种体验，则恰恰是现代制度安排——学校、托育机构、课外班轮转——在不经意间系统性地制造出来的。它们提供了高质量的“功能执行者”，但无法提供“不可替代在场的肉身”。那个功能执行者可以换班，可以辞职，可以被另一个同样专业的执行者替换——而这种可替换性本身，就在孩子的心智底层写入了一条和生育力无指标形态背道而驰的信息：“没有一个特定的人是我不可的。”

这正是功能解耦论的反面真相：外部制度对可流通功能的全面收编，非但没有“减轻”婚姻的负担，反而通过将那些流通功能一一接走，把那个不可流通的核心残余——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孤立地、没有分压余地地暴露在了婚姻内部。这就像把一栋房子里所有能被搬走的家具都搬走了，然后告诉剩下的两个人：“现在你们可以更自由地享受这里的空间了。”但他们享受不了，因为搬不走的不是家具，是这座房子本身压在他们身上的全部重量。

4.3 其他亲密关系为什么不能分摊？

要确立“婚姻作为孤岛”的论断，必须回答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其他亲密关系——成年兄弟姐妹、深厚的友谊、稳定的社区联结——不能分摊这个重量？

答案不在于这些关系不够亲密，而在于它们在当代社会中被组织起来的方式，同样已经被绩效逻辑所深度渗透，因而丧失了承载“无指标在场”的能力。

考虑友谊。现代社会中的友谊——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友谊——正在经历一种可被称作“功能性收编”的过程。朋友之间的相处越来越依赖于“有理由的聚会”：聚餐、看电影、一起参加某个活动。当一个成年人感到疲惫、仅仅是想找一个人“待一会儿”时，他往往发现，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理由去发起这样的邀约。“就是想见见你”——这句话在当代友谊中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好久没聚了，什么时候约个饭”。朋友当然是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但这种支持的提供往往是有时间边界、有主题框架、有互惠期待的——它是一种“事件性”的在场，而非“弥漫性”的、随时可用的、不以任何特定事件为前提的在场。

社区联结的处境更复杂。稳定的邻里关系、宗教团契、志愿组织——这些曾经提供弥漫性在场的传统结构，在当代社会中要么正在萎缩（如宗教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要么正在被“履历化”（如志愿服务被纳入升学申请或职业档案的评估体系）。当社区参与本身成为一项有待评估的“活动”，它就不再能够提供那种“不为了什么而在一起”的在场。一个人去社区中心做义工，和他小时候在院子里和邻居阿姨有一搭没一搭地剥豆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形态。前者被纳入了一个可被记录、可被验证、可被写入简历的时间经济中；后者是时间的溢出，没有任何人会计量它，没有任何人会评估它。而生育力无指标形态所需要的，恰恰是后一种时间——溢出性的、非被计入任何账簿的、仅仅因为“人在这里”而发生的时间。

代际关系——祖辈分担——仍然是最接近传统共同体功能的一种补充机制，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中尤为普遍。祖辈参与带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年轻父母的压力。但它同样有一个结构性的局限：它分担的主要是功能性任务（接送、做饭、日常照料），而那个弥漫的、不以特定产出为目标的“持续在场”本身，祖辈分担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祖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本体论上是不对称的。孩子对父母在场的那种需求——那个原始的、根本性的“我的父母此刻在”——是无法被祖辈的在场完全替代的。这不是祖辈不够好，而是两种关系的本体论性质不同：父母是不可替换的第一依恋对象，而祖辈是补充性的依恋对象。再者，现代老年生活也被日益卷入消费、旅游和广场舞的节奏之中，他们有时间陪孙辈，但在体力和情感上，以及在他们自己对晚年自由生活的期待上，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帮忙但不全包”。综上，祖辈的分担机制不是没有，但它在承接体量上始终小于生育力无指标形态的总体重量——并且这个重量在日益加码。

当友谊、社区联结和代际互助都被各自的绩效逻辑或本体论局限所削弱时，婚姻——或者更精确地说，核心家庭中的亲密关系——就成为那个唯一剩下的、没有任何外部系统可以替代的、非流通的

孤岛。它不是被选择的，它是被遗留的。而且一旦它成为那个孤岛，它承载生育力无指标形态的方式就不是“分担”，而是“兜底”。

4.4 “退出成本”的实质：不是经济锁定，而是本体论锁定

既有文献中频繁使用“退出成本”来解释夫妻为何承受重压而不退出婚姻或退出育儿竞争。这个解释方向是正确的，但它通常将退出成本理解为经济成本（离开婚姻后生活水准下降）或社会成本（被亲友指责、被污名化）。生育力遗留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另一层更深的本体论锁定：退出之所以不可能，不是因为代价太高，而是因为那个正在被承载的东西——不可替代的在场——本质上无法被退出。

经济功能可以退出——你把做饭外包，你确实退出了这项功能。教育功能可以部分退出——你送孩子去寄宿学校，你退出了日常的学业监督。但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是无法退出的，因为“退出”的预设是存在一个外部选项可以承接这项功能。而那个弥漫的、不以特定产出为目标的持续在场，没有任何外部选项可以承接。你可以不自己教孩子数学，但你不可以不做“那个在孩子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人”——因为如果你不做，没有人能替你做。那个位置不会空着：它会被其他人（祖辈、保姆、机构照料者）以各种不稳定的方式局部填满，但那种“被一个不可替代的人持续注视着”的安全感，将永远留下一个裂缝。而大多数父母，在情感和伦理上，无法承受成为制造那个裂缝的人。

这就是“功能锁死”论述没有抵达的那一层。功能锁死论说“退出成本太高所以被锁死”，它预设了如果退出成本降低，夫妻可以选择退出。但生育力遗留所揭示的是：这里根本没有“退出”这个选项。它不是被外部制度锁死的，它是被那个不可流通之物的本体论性质所锚定的。夫妻当然可以选择离婚、选择放弃抚养权、选择把孩子送走——但这些选择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孩子的心智底层，那个关于“谁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人”的位置，总是被某些具体的人占据着。如果父母退出，那个位置不会消失，它只会以其他更不稳定、更不可预测的方式被填满。而大多数父母，无法对那个可能产生的裂缝视而不见。他们不是因为核算了成本收益才留下，他们是因为那个正在被承载的东西——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根本就不提供“退出”这个动词的适用语境。

五、沉默的十五分钟：三重错位的发生现场

前文的论证从宏观制度与演化人类学的层面确立了生育力遗留的发生机制。现在，必须回答那个最切身的问题：这种遗留，为什么在当事人的主观体验中如此难以被识别和表达？为什么沉浸在其中的人描述的不是“我在承担一项沉重的责任”，而是“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觉得特别累”？

答案在于：当一个人正在承载一件本质上无法被识别为“功能”的沉重之事时，他用来理解自己处境的全部语言资源——那些由社会提供给他的描述范畴（“养育”“陪伴”“责任”“爱”）——都不精确地匹配他的体验。他感到沉重，但在社会词典里找不到一个对应那个沉重的词。他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养育”或“陪伴”来权宜地命名它，然后发现那个命名总是漏掉了一些东西——那些沉默的、没有产出的、仅仅作为在场而存在的漫长时刻。

这不是一纸诊断书上的静态“三重错位”——时间结构的错位、叙事身份的错位、社会期待的错位——而是一出在夫妻日常互动中，被那个没有名字的沉重之物驱动着，一步一步地、一轮一轮地结算出来的动态失败。以下，本文以一对夫妻的十五分钟沉默为解剖现场，追踪这个“说不出的沉重”如何在每一分钟里，经由夫妻各自认知框架、情感资源与既有对话模式的约束，被层层错位成那些可说出来的指责与沉默。

这是晚上十点。

克里斯蒂娜瘫在沙发上。四十分钟前，她刚把最后一个孩子哄睡——先是八岁的女儿要喝水，然后是六岁的儿子说房间里有影子。她从儿子的房间出来，走进客厅，在亚历山大旁边坐下。他正在看手机，屏幕上的光把脸照得发白。他们之间隔着两个靠垫的距离。

第一分钟。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这种沉默本身不是什么异常——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夫妻间的沉默时刻已经比对话多得多。但今晚的沉默有些不同。克里斯蒂娜感觉自己正在被一种无形的重量往下压，她的胸口是紧的，脑袋是木的，手脚沉重得像被灌了铅。她不知道怎么了。她今天做的事，和昨天、前天、大前天没有任何分别。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盯女儿练琴一小时、回复家长群里老师的五条通知、查到儿子下一期编程课的时间冲突、给女儿下周的演讲比赛打印资料、在儿子因为乐高搭不好大哭时坐在他旁边地上陪了二十分钟。这些事，单独拎出哪一件都不足以让人崩溃。甚至列在一起，也凑不出此刻压在她身上的那种重量。

她想说什么，但她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个句子来开口。“我好累”——但累什么呢？她知道如果她说“我好累”，亚历山大一定会问“你今天做什么了”——那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真正累的原因，不在今天任何一件能说得出名字的事情里。她真正累的，是白天那二十次她根本不会记得的微小在场：儿子在iPad上做数学题，每做完一道就喊“妈妈你看”——她只要往屏幕上看一眼说“嗯对的继续”，他就安心地做下一道。那个“嗯对的继续”，在任何一个任务清单上都不构成“一件事”，它连一秒钟都花不了。但它要求她不能沉浸到任何一件她自己的事情里去——她的注意力必须随时准备好被打断。她的在场，就像一台永远不关机的待机服务器：不做任何运算，但必须持续供电。一整天下来，这种持续的“待机”耗尽了她的全部力气。她有太多这样的力气，花在了“没发生任何事”的时刻里。

这件事，她没有语言可以描述。因为她的疲惫来自“待机”，而“待机”在功能性的时间语法里是“空”的——它不被记录为任何一件事，不被赋予任何价值，不在任何一张待办清单上。当她试图用“我今天做了什么”来解释“我为什么这么累”时，她发现她的证据链是断裂的。那些真正耗尽她的事，在她的时间账本上全部为零。

第三分钟。亚历山大也在看手机，但他不是真的在看。他在想白天老板说的那句话——“这个季度的KPI还差一点，你们组再加把劲。”他感到一阵熟悉的焦虑。然后他想到房贷，想到女儿明年的私

校申请，想到儿子在编程课上似乎跟不上进度——是不是该给他换个老师？他的大脑一刻不停地在处理这些可以列入“待办事项”的东西。而对于克里斯蒂娜的沉默，他的第一反应——在进入意识层面之前就已经发生的那个反应——是他感到隐隐的不安。他知道她可能累了，但在这个疲惫的夜晚，他没有余裕去探究她的疲惫。他只是下意识地在等待一个信号：她会不会开口说什么？如果她不说，他们就可以各自安静地待着。这样他的精力就不需要被进一步消耗。

他不知道的是，克里斯蒂娜此刻正在看着他的侧脸。灯没开，从他的角度她只是一个沉默的人影。但在她的视网膜上，他的沉默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她看着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手机，心里升起一股她不想承认的怨怼。她被抽干到了这个程度——不是被具体的事，而是被那种弥漫的、一整天不间断的“待机”抽干——而他看起来，至少在表面看起来，那么安然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可以“下班”。他可以在回家后进入一种“任务完成”的状态。而她从来没有下过班。她不想在这个时候讲道理，不想在这个时候“沟通”，她只想他能主动过来，坐近一点，说一句“今天辛苦了”——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具体的事，而只是因为她今天存在了。存在一整天没有名字的消耗里。但他不开口。她盯着他的侧脸，心里那块沉重的、说不出名字的东西，开始慢慢发酵成一种更尖锐的情绪。

第六分钟。她是否在这一瞬间，错把“生育力无指标形态压在自己身上的重量”，归因成了“他对我的苦视而不见”？是的。但这个错位不是她的个人错误。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必然：因为在现有的关系语言里，只有“你做了什么事”和“你没做什么事”这两个语法槽。而那个弥漫的、没有名字的消耗，无法被放进任何一个槽里。她无法说“你没有替我承担那个没有名字的重负”，因为“那个没有名字的重负”不被社会词典收录。她只能退一步，把它翻译成一种可以被伴侣识别的情感语言——“你不够参与”“你不理解我有多累”——而这恰恰是错位的开始。当一个人的自我消耗无法被主谓宾结构所捕获时，她只能把自己的沉重硬塞进现有的、但不精确的关系语法里。他们的对话被设计来处理“具体的事”：谁去接孩子、下周末的安排、女儿的数学需不需要加课。当克里斯蒂娜的沉重是一件“不是具体的事”的东西时，她和亚历山大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对话频道可以承载它。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沉重转化为抱怨。而亚历山大听到那些抱怨时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他会困惑，会辩护，会列举自己做过的事，会觉得自己的努力被全盘否定。他不理解的是，他做的每一件“具体的事”——加班赚钱、规划未来、操心学业——都完美地覆盖了功能性责任的区域，但恰恰漏掉了那个不在任何区域里、弥漫在全部区域中的无指标在场。

第十一分钟。这时沉默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分钟。亚历山大终于放下手机。他往克里斯蒂娜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确实注意到今晚的气氛有些不对劲。他想做点什么来打破僵局，但他脑子里能想到的全部选项都是功能性的：“要不要我去洗个水果？”“明天早上我送孩子。”——这些具体的、任务性的事。他无法想到“抱她一下”这个选项，不是因为他不爱她，而是因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此刻的问题是“她太累了，我应该帮忙做点事”。他不知道，她此刻需要的恰恰不是“做事”——她需要的是有人承认那个无法被任何事所代表的消耗。但“承认那种消耗”这个动作，既不在他的行为剧目里，也不在一个被绩效逻辑训练了一辈子的男人能够直觉地触达的范围之内。他最终没有走过去。他选择了继续看手机。

在他心里，这个选择被解释为“给她一点空间”——这是他从某篇关于婚姻经营的文章里学到的功能性知识。他不知道，那个功能性知识在这一刻是完全失效的。因为它把沉默当作一种需要被对策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当作一次被无指标重量压得开不了口的求助。

第十五分钟。克里斯蒂娜看到了他拿起手机的那个动作。在她的解读里，那是他选择了“再一次”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她心里那块发酵了一整晚的东西，现在终于凝结成了一种清晰的委屈。她感到眼眶发酸，但忍住没有哭。她站起身，说了句“我先去洗澡了”，然后走进了浴室。门在她身后关上。

在那个关门声里，三重错位完成了全部结算。不是克里斯蒂娜责怪亚历山大，也不是亚历山大责怪克里斯蒂娜。而是那件压在他们之间的、没有名字的沉重之事，成功地让两个人都误以为对方的沉默是某种针对自己的态度。克里斯蒂娜把亚历山大的沉默解读为冷漠——因为他没有看见她的消耗。亚历山大在之后多少次回想这个晚上时，将把克里斯蒂娜的沉默解读为“又在冷战”——因为他不理解自己明明做了所有“该做的事”，为什么她还是不开心。而他们都没有看见，那件真正把他们压得说不出话的东西，是他和她都无法命名的。他们看不见它，所以只能看见对方。

追踪这十五分钟，三重错位的发生链条便清晰可见：第一重，时间结构错位——克里斯蒂娜无法用“我今天做了什么”的时间语言解释“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那个让她累的东西不被记录在任何时间账本上，它只是弥漫性的“待机”。这个错位本身就直接引发了第二重：叙事身份错位——当生育力遗留的重量无法在功能性的“我做了什么”叙事中被安放，它就会寻找最近的、可被表达的出口：抱怨伴侣。于是原本指向结构性困境的沉重，被转译为一种指向关系内部的态度指责。而第三重——社会期待错位——则为前两重错位提供了持续运转的燃料：男女双方都被嵌入一套“好父母”“好伴侣”的性别化剧本，他们用来应对问题的行为剧目已经被这些剧本所限定。亚历山大的剧本告诉他：妻子累了=需要帮忙做事。克里斯蒂娜的剧本告诉她：我已经做了所有妈妈该做的事，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够？剧本里都没有一句台词教人说出“我们正在承受一件事，它很重，它不是任何人的错，它没有名字”。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做错了任何一件具体的事。但他们被遗留下了一件没有任何“具体的事”能够装得下的东西。这就是生育力遗留——它不在任何社会词典里，所以它只能用沉默来承载，而沉默永远被误读。

六、与既有研究传统的划界与对话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必须通过严格的划界校验：它与已有的、在相近领域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传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只是已有概念换了一套措辞？如果不是，它切开了哪些已有概念切不开的东西？本章将通过三项关键的划界，论证生育力遗留概念的不可还原性。

6.1 划界一：生育力遗留与亲职压力传统

亲职压力文献是当前研究父母耗竭问题最成熟的理论传统。它的核心贡献在于识别出一系列可测量的压力源——角色冲突（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张力）、社会支持不足（缺乏制度性托育支持）、经济压力（养育成本上升）、儿童行为问题带来的额外负担——并论证这些变量的叠加效应导致父母的主观耗竭感。这一传统为理解当代父母的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且已发展出标准化的测量工具。但本文要论证的正是，在亲职压力传统能够触及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质性上截然不同的沉重——一种无法被归因于任何特定压力源的弥漫性耗竭。

生育力遗留与亲职压力的根本区别在于：亲职压力处理的，是“压力源”与“压力反应”之间的因果链条。一个可识别的压力源（比如孩子的学业困难）引发了父母的可测量的压力反应（焦虑、疲惫、挫败感）。而生育力遗留所指出的，恰恰是那个“压力源无法被识别”的状况本身——当一个人感到被掏空，却无法在“我今天做了什么事”中找到对应那个感受的原因时，他正在经验的就不是亲职压力，而是生育力遗留。亲职压力量表可以捕捉到“我感到被育儿责任压得喘不过气”这种主观感受的强度，但无法区分：这种感受是因为“我今天做了太多事”而产生的（可归因的疲惫），还是因为“我一整天处于待机状态、没做任何可以被叫作事的事、但就是被耗干了”而产生的（不可归因的疲惫）。两种疲惫可能在量表上报告相同的分数，但它们的体验质性截然不同——而亲职压力文献的工具箱里，没有为后一种疲惫准备一个独立的概念格子。生育力遗留填入的，正是这个格子。

6.2 划界二：生育力遗留与情感劳动传统

情感劳动概念——尤其是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绪管理”框架——与生育力遗留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关联，也因此需要最清晰的划界。情感劳动理论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许多职业和家庭角色要求从业者管理自己的情绪、制造特定的情感状态以满足他人（或客户、或家人）的期待。空乘人员必须微笑、客服代表必须保持耐心、母亲必须在疲惫时仍然对孩子温柔——这些都不是“自然发生的”情感表达，而是经过有意识的自我管理才能生产出来的“情感商品”。情感劳动理论成功地将这些隐形的付出带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并为其争取到了“劳动”的正当性地位。

生育力遗留与情感劳动的关键区别在于：情感劳动，终究是一种劳动——它有付出者、有接收者、有可以被期待的产出（客户的满意、孩子的安心）、有可被识别的“管理”动作（抑制愤怒、刻意温柔、调整语气）。你可以就情感劳动的分配向伴侣提出诉求——“我做了太多情感劳动，你能不能分担一些？”这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被讨价还价的主张。但生育力遗留所指出的，恰恰是那个超越了劳动范畴的东西：那种弥漫性的在场本身。它不一定涉及任何特定的“情绪管理”。当克里斯蒂娜坐在儿子旁边看他搭乐高时，她没有在管理自己的情绪——她只是在“在”。那个“在”不是一项技能，不是一种可以被学习、被优化、被分配到另一个执行者身上的任务。它更像是一种存在的基质——它在，它就是它自己，它不指向任何可识别的产出，但如果没有它，所有其他的功能性付出都会失效。情感劳动概念可以为“我为了安抚孩子的情绪付出了很多努力”提供一套分析语言，但它无法为“我一整天只是在那

儿、什么都没做、但还是被耗干了”提供概念空间。生育力遗留切入的正是这个空间：不是劳动的不可见，而是存在的不可见——一种弥漫性的、非-任务性的、不以任何可预期产出为目标的沉重。情感劳动关注的是“做”的隐形成本，而生育力遗留关注的是“在”的不可度量性。

6.3 划界三：生育力遗留与安全依恋传统

安全依恋与发展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已在3.3节有所讨论，此处需要从不可还原性的角度进行更精确的划界。鲍比的“安全基地”概念及其后续实证研究，为理解儿童心理健康的人际基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但安全依恋理论所描述的，是儿童一端的发展结果——一种内在运作模型，它使儿童感到自己是受保护的、值得被爱的、可以安全地探索世界。安全依恋是儿童从持续的、情感可及的在场中获得的心理收益。而生育力遗留所描述的，是成年人一端的那个“在场”本身——不是在追问“我的在场是否让孩子建立了安全依恋”（这个问题已经将“在场”功能化了，把它当作了安全依恋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手段），而是在追问：当成年人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在场者”——不是作为一项可以被学习的育儿技能，而是作为一种弥漫的存在状态——时，这件事本身的沉重，如何在成年人的主观体验中制造出一种独特的痛苦？

此外，本文还要诊断一个在当代育儿文化中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鲍比在提出“安全基地”概念时，他所描述的是一个在自然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自发出现”的心理结构。儿童的安全依恋，是在感受到持续的可达性后，自行形成的——它不是一项需要被刻意“建立”的工程。但在当代高投入育儿文化中，“提供安全依恋”已经被异化为一种有意识、以结果为导向、有评估标准的养育行为。各种依恋养育指南、育儿课程、亲子关系评估工具，把安全依恋从一个自然而然的关系品质，翻译成一项可以去学习、去执行、去优化的养育KPI。这种异化，恰恰是生育力无指标形态被“功能化”的一个典型症状。而当“安全依恋”成为KPI，那种弥漫的不以产出为目标的在场本身就进一步被挤压：因为你永远觉得“光是待在那儿”是不够的——你总应该“做点什么”来确保那个安全依恋被建立得更牢固。生育力遗留概念捕捉的，就是这个历史性转变在成年人体验中所制造的额外耗竭：明明做了一切育儿手册推荐的事，却仍然隐隐感到——一种无法被手册记录的东西，正在从你们的日常中被挤压出去。那是土壤本身在被置换成化肥时无声的消失。

回到问题本身，生育力遗留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概念。它与亲职压力的区别在于，它不处理“可识别的压力源”，而处理“压力源不可识别”这一状况本身。它与情感劳动的区别在于，它不关注“做”的隐形成本，而关注“在”的不可度量性。它与安全依恋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儿童发展结果的另一端，而是成年人存在形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转变——一种从“土壤的弥漫”到“KPI的执行”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在成年人主观体验中所制造的、现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概念都未能命名的那种特殊的、说不出的沉重。

七、最有力的质疑与回应

一个严肃的反驳者会以几种方式挑战本文的诊断。本节主动面对其中最有力的四个质疑并作出回应。

质疑一：你用了一个新名词去描述一个老问题。“不可替代的在场”不就是发展心理学说了半个世纪的“安全依恋”吗？“无指标的维系”不就是鲍比所说的“安全基地”的另一种说法吗？你只是把已有概念换了个名字。

这个质疑触及本文核心概念能否通过不可还原性校验的关键。第六章已与安全依恋传统进行了系统划界，此处仅收束最关键的区分：安全依恋和安全基地所描述的，是儿童从持续的、情感可及的在场中获得的心理收益——一种内在运作模型，它指向一个可被观察和评估的发展结果。而生育力遗留所描述的，不是儿童那一端的结果，而是成年人那一端的存在形态本身——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存在形态被排挤、压缩、孤立的过程。它描述的不是“土壤对植物的影响”（那是发展心理学），也不是“园丁付出了什么劳动”（那是情感劳动和亲职压力），而是“土壤本身正在被从广阔的田野铲进花盆里”——以及铲进去的土壤，它的体积、它的重量、它弥漫而不被任何测量工具所捕获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问题。这个意象，发展心理学和家庭社会学的既有概念都够不到。安全依恋理论可以告诉你“植物需要多少土壤才能长好”，但它不能告诉你“当土壤的搬运者是一个人时，那个人在搬运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什么”——因为搬运土壤本就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你突然要求一个人独自搬运一块需要二十个人抬的田——这不是植物需不需要的问题，这是搬运者被压成什么样子的的问题。

质疑二：你这套分析听起来是在浪漫化传统的大家庭和共同体——仿佛前现代社会是田园诗，现代性是堕落。但前现代社会有它自己的暴力、压迫和痛苦。你确定你不是在用一种怀旧叙事替代分析？

这个质疑触及了本文的一个关键边界。必须明确：本文在演化人类学层面援引合作繁殖的证据，不是为了论证前现代社会更“好”，更不是为了主张回到某种传统家庭模式。合作繁殖的共同体网络在前现代社会确实分摊了生育力的无指标重量，但它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性别压迫、等级森严、个体自由受限等问题。本文不从规范性角度评价这些社会形态。

本文的论证建立在一条严格的发生学逻辑上：当社会结构的演化——城市化、劳动市场化、性别角色变革——拆解了生育力原有的广泛承载网络时，那个被遗留的不可流通之物的承载方式，就必然发生转变。这不是道德叙事，而是结构性分析。就像一条河流被改道后，下游的洪泛区会发生变化——这不是在说河流改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而是在说水流和地形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现代家庭是否比传统家庭更糟”，而是“现代家庭中那种弥漫性窒息感的产生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地隐藏在生育力承载结构的历史转变之中。此外，本文在第三节所补入的历史过程分析，恰恰揭示了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核心家庭天然不好”，而在于当代核心家庭被要求独自承载一

件历史上从未被要求由一个二到四口人的单元独自承载的事。这与怀旧无关，与因果关系有关。

质疑三：你的诊断覆盖的是城市中产阶层。对于不参与教育军备竞赛、生存本身是主要焦虑的家庭来说，婚姻的困境可能完全不同。你确定你的分析框架对这些家庭有效吗？

必须接受这个批评的地理和社会阶层限制。生育力遗留这一诊断，其强度与清晰度在那些有相对充裕资源投入到子女“培育”中的阶层最为显著——这个阶层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与财力，也有更强的阶级下滑焦虑，因此最容易被度量系统的收编逻辑所捕获，也最深切地体验到“可度量功能被收编后、不可度量残余被遗留”这一机制。但还须说明三点。第一，即使分析的范围主要在中产阶层，它所覆盖的人口规模与话语影响力仍然相当可观。中产阶层的婚姻叙事会通过媒体、教育机构和文化生产而被广泛传播，并被视为“普遍的婚姻困境”，因此揭示这一阶层困境的机制本身具有文化诊断的价值。第二，生育力遗留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其适用边界并非由阶层标签来划定，而是由“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是否被从广泛共同体中抽离并集中压入亲密关系”这一结构条件来划定。对于生存焦虑占主导的家庭来说，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压力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框架完全失效——它只是意味着在这些家庭中，生育力遗留的强度低于其他压力源（经济不稳定、超长劳动时间、基本物质匮乏），且可能在形态上更多表现为对下一代能否“活得下去”而非“活得多好”的弥散性担忧。在不同福利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的环境中，“遗留”的形态和强度也会不同。这一边界是清晰的：生育力遗留诊断适用于任何“可度量功能被外部制度系统性收编、而不可度量残余被集中锚定在亲密关系中”的社会情境。在这一边界之内，具体的阶层差异不是对框架的否定，而是对框架内变量强度差异的描述。

质疑四：如果“生育力遗留”是结构性压力，为什么不是所有中产婚姻都感到窒息？为什么有些家庭似乎还能维持功能性与情感性的平衡，甚至育儿过程还增进了夫妻关系？

这个质疑需要被认真回应，因为它追问的是核心判断的调节变量。必须首先承认：生育力遗留的强度在不同家庭中差异极大，而有些家庭确实能够在高强度的功能投入中维持——甚至增强——婚姻的情感品质。这个事实不构成对核心判断的证伪，但它揭示了本文在普遍性宣称上必须保持的节制。

造成差异的关键调节变量至少包括以下四种。第一，外部支持网络的残余强度。那些仍然保有紧密的代际合作（如祖辈同住并深度参与日常育儿）、或者建立了非正式互助社群的夫妻，实际上部分重建了生育力的分担结构——尽管这种重建往往是脆弱的、临时的和高度依赖偶然条件的（一个愿意且有能力帮忙的祖母、几位住在同小区的亲密朋友）。这些家庭的“平衡”，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本文的诊断：不是他们没有承载生育力，而是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局部的、私人化的方案来分摊它。第二，夫妻双方的情感资源与经济资本。拥有较高情感调节能力、较充分的睡眠、较宽裕的经济条件、以及灵活工作安排的夫妻，在承受相同结构压力时，主观体验的耗竭程度会显著降低。但更要紧的是，这些调节变量大多本身就是阶层优势的另一种形式——它们不仅没有否定生育力遗留的结构性，反而将它锚定在了更精确的社会分层坐标上：那些最无力承担生育力遗留重压的家庭，恰恰也是最缺乏这些调节资源的家庭。第三，对“好父母”剧本的认同程度与内化深度。那些能够相对抽离地看待教育军

备竞赛、不把“完美父母”身份当作自我核心认同的夫妻，被生育力无指标形态榨干的程度会更低。但这种“抽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本的体现——它通常需要较高的教育水平、对主流叙事的反思能力、以及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不依赖于子女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第四，将这个“无指标”的沉重纳入夫妻“共同意义感”框架的能力。一些夫妻能够将育儿过程中的弥漫性付出，叙说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这种叙事本身不会减轻重量，但会改变承受重量的姿势：从“我被压垮了”到“我们在共同背负”。然而，这种共同意义感的建立高度依赖双方情感交流的质量与频率，而情感交流的质量与频率，恰恰是最容易被生育力遗留本身所挤压的东西。这是一个悖论性的循环：生育力遗留越沉重，夫妻越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那种“不为什么”的情感交流；而越缺乏那种交流，他们就越难以把遗留的重量纳入共同意义感的框架中去承载。

这些调节变量的存在，不削弱生育力遗留作为结构性诊断的效力，反而使其更加精确：它预言，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外部支持网络越薄弱、夫妻双方的情感资源与经济资本越匮乏、对“好父母”剧本的内化越深、建立共同意义感的能力越差，生育力遗留所导致的主观窒息感就越强烈。这是一个可被进一步实证检验的命题框架，而非一个宣称“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笼统断言。

八、破局：敢于命名那个没有名字的东西

如果前文的诊断是正确的——婚姻正在承载一件沉重但无法被识别为“功能”的东西；这种东西的沉重感恰恰来自它不被任何社会词典收录，不被任何绩效指标看见，不被任何“好父母”剧本写进台词——那么，出路就不在“卸下重负”（因为承受的事是无法卸下的，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外包的任务），而在“敢于承认它的无名称性”。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太轻巧的结论。但它的分量的确存在。因为制造窒息感的核心机制之一，恰恰是那种“想说说不出、想指认指认不了”的认知困境。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承受什么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种承受转化为对伴侣的抱怨（“你不够参与”），或者对自我的怀疑（“是不是我太脆弱了，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就我撑不住”）。这些转化是关系的慢性毒药——它们把系统的结构性困境，伪装成个人的性格缺陷或关系的情感失败。而一旦夫妻中的至少一方能够在某个时刻说出——甚至不需要对伴侣说出，只需要对自己说出——“我们正在承受的东西，不是养育，不是责任，不是爱，而是一种弥漫的、不以任何成果为目标的、仅仅作为了不可替代的人活在孩子生命中的持续在场。这个东西没有名字，不在任何清单上，被排除在所有绩效评估之外，但它耗尽了我们的全部力气。”——这个认知本身，就有潜力改变承受重量的方式。

它不减轻重量。生育力无指标形态的沉重，不会因为被命名了就变轻——就像搬一块石头，不会因为你知道它叫“花岗岩”就变轻。但它改变了重量在夫妻之间的分配形态：从“我们在做一件所有人都能轻松做到、只有我们这么累的事”（这个认知是高度自我贬损的，它让夫妻中的每个人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转变为“我们在独自承载一件被整个文明的制度安排所看不见、却要求我们必须独自完成

的事”。后一种理解不把重量从承重者身上移走，但它把重量从“我们做错了什么”的负罪感中释放出来，还给它真正所属的结构。它让夫妻从互相指责的困局中抬一下头，看一眼那座压在他们身上的、名为“生育力遗留”的、制度性的山。那座山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搬来的，但他们此刻正在共同扛着它。这个认知，是从“互相抱怨”到“共同面对”的认知前提。

在这个认知基础上，才有微观实践的可能。刻意地在家庭时间里留出那些“不为什么”的时刻——不是为了修复关系、不是为了高质量陪伴、不是为了任何可以被列入日程表的理由，而仅仅是为了让两个人重新练习“不为了什么而待在一起”。这种实践的价值，不在于它解决了什么功能性的问题，而在于它为那种无指标的在场提供了一个被共同经历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生育力的无指标重量没有被卸下，但至少有两个人一起看着它，而不是各自在沉默中独自承受。这与育儿手册上推荐的“定期约会之夜”截然不同：后者的逻辑仍然是功能性的——它把“夫妻独处时间”当作一项维系关系的投入，期望获得关系质量改善的产出。而“不为了什么而待在一起”取消了这个期望。它不提供任何可测量的关系收益。它的全部价值，就在于那段时间里谁也不需要产出什么，谁也不需要为那段时间的“效果”负责。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度量系统逻辑的一种暂时性悬置。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越来越多年轻夫妻选择不生育或减少对教育竞争的参与度，不应被简单地解读为“自私”或“不负责任”。从生育力遗留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些行为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性的“退出实验”——他们在用自己的生活投票，表明那个被制度性地压入婚姻的无指标重量，已经超出了个体情感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些退出行为不会直接改变制度，但它们所累积的社会事实，可能最终会迫使制度的维护者面对一个他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如果“独自承载生育力无指标形态”这个隐性条款，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逼得不进入或退出婚姻与生育，那么这套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就必然会被重新审视。

九、结语与证伪条件

本文从既有解释的共享预设出发，诊断了一个被忽略的理论要害：当代婚姻困境的深层根源，不在于功能维度的增减，而在于社会功能度量系统全面收编了可量化的培育功能之后，那个不可度量的残余——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在共同体网络同步瓦解的进程中，被集中地、排他地遗留进了核心家庭内部。这一转变，使得婚姻承载了一件无法被识别为“功能”的沉重之物。它占据全部时间、消耗全部精力、让人精疲力竭，却不在任何社会词典里拥有一个名字。这种“无名称的沉重”，是弥漫在当代中产婚姻中那种“说不出哪里不对”的窒息感的发生学根源。

本文的分析进路既不是功能解耦论的功能流失叙事，也不是功能锁死论的功能强化叙事，更不是某种怀旧式的“回归传统家庭”。它是一篇发生学分析：它不追问“婚姻的功能变成了什么”，它追问“婚姻曾经承载的、那个不被当作‘功能’来命名的东西，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被怎样挤压、排挤和重新安置”。本文给出的回答是：它被遗留了——从广泛共同体的弥漫性在场，被压缩进了二到四口人之间

的沉默性共存。

最后，请允许本文遵守一条应有的诚实纪律：一个负责任的判断，必须告诉读者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判定为错误。

如果有一天，那些承担高强度子女培育任务的中产父母——即那些在功能维度上投入最多、在时间结构上最受绩效逻辑支配的群体——在系统性的调查中显示，其婚姻满意度和个人心理福祉并未显著低于那些在育儿上“低投入”的对照组；更进一步，如果数据显示，这种功能性的高强度投入（辅导作业、规划课外活动、参与家长社群）反而成为夫妻间“共同意义感”的可靠来源，从而使他们在婚姻满意度上持续高于低投入群体——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将被证伪。因为这意味着，生育力的无指标形态与功能性的培育任务，可以在同一个核心家庭结构中被同时高度激活而不相互挤压，也意味着本文所描述的“遗留”只是过渡性现象，而非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同样，如果有证据表明，当外部支持网络（祖辈参与、社区互助、友善的工作—家庭政策）被充分提供之后，那部分弥漫性的窒息感并未如本文所预期的那样显著减轻——这也会对本文的判断构成有力挑战，因为它表明生育力遗留的机制并非核心压力源，或至少不是如本文所声称的那样是弥漫性耗竭的首要发生学根源。

在这一证伪条件被满足之前，本文愿意坚持这个也许不讨喜的判断：当代婚姻正在被一件无法被看见、无法被命名、无法被列入任何任务清单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这个东西不是任何一种功能，但它比任何功能都更沉重——因为它是那个在被度量系统全面收编之后、在共同体网络瓦解之后，唯一无法被收编、也无法被分摊的、关于生命本身的残余。当夫妻在深夜的客厅沙发上沉默地坐着，各自承受着一件说不出名字的事，他们不是婚姻的失败者。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肉身，扛着一整个文明甩下的包袱。

参考文献

- Abidin, R. R. (1992). The determinants of paren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21(4), 407–412.
- Bianchi, S. M., Robinson, J. P., & Milkie, M. A. (2006). *Changing Rhythms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Bowlby, J. (1988). *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 Basic Books.
- Damasio, A. R. (1994).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Putnam.
- Damasio, A. R. (2010). *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 Pantheon.
- Dweck, C. S. (2006).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Random House.
- Erikson, E. H.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W. W. Norton.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eman, D. (1995).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Bantam Books.
- Gopnik, A. (2016). *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 What the New Science of Child Development Tells U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rdy, S. B. (2009). *Mothers and Others: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reau, A.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ad, M. (1928).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William Morrow.
- Piaget, J. (1952).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nnicott, D. W. (1965). *The Matu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Winnicott, D. W.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Tavistock Publications.